
“华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

——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动向——

周 星

(ZHOU Xing, 爱知大学)

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界的重要事件之一是提出了“抢救”和“保护”各民族非物质的民间口承文化遗产的任务。为数甚多的学者和知名人士的呼吁，得到了政府异乎寻常的响应，目前有关的国家项目和财政预算，已经和正在积极地落实之中。文化知识界与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默契，意味深长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获得初步发展及“全球化”不断浸润的背景下所面临的境遇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

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的“文化讨论”中，“现代化”理论经常被用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近年又进一步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它们虽在很多方面有所分歧，但却有两个基本起点颇为相近：1、都倾向于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一个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内部同质的整体，2、都倾向于把“中国文化”看作是文化“现代化”的对象或其对立面，于是，中国文化似乎不言而喻地就具有了“前现代”或“传统”的属性。

本文不准备详细讨论现代化的文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具体得失，而试图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境遇及其动向的角度，揭示中国文化之内涵的复杂性及有关文化问题讨论的局限性。

一、“华化”：重新诠释“汉化”

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显然有非常多样和复杂的内涵，很难将其简单处理成一个单纯和同质性的整体；而且，作为各民族当代存续的生活方式，少数民族文化是否可被看作是文化“现代化”的对象，也大有疑问。讨论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时，我们或许需要采用其它一些不同的描述性或分析性概念。例如，在涉及国内民族关系的汉语文献中，“汉化”及相关的一些概念，就是值得重视和需要给予深入检讨的。

“汉化”一词，大体上是指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和汉人族群的互动中，较多或大面积地接受了汉文化，甚或丧失民族认同，最终被汉人“同化”的现象、过程与结果。由于“同化”过程既有文化间互动涵化的情形，也有伴随着暴力和强制的情形，因此，“汉化”就在很多场景下被赋予了消极的意义。

显然，使用“汉化”这一概念来描述和分析国内各族之间文化关系的事实和情形，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诚如费孝通教授的“多元一体”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很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绝不仅限于“汉化”，还应当包括“少数民族化”。其次，当前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增长的事实，固然有来

自“优惠政策”的影响，但它同样也对单方面的“汉化”说提出了质疑。第三，把国内的民族关系包括复杂的文化互动关系，理解为只发生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这本身就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不同的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彼此间的文化互动往往也可能更加重要。此外，常常也有以某个少数民族为主的文化格局，汉人族群只是其多元的“地方族际社会”中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的情形。

尽管如此，“汉化”这一概念在经过一番剥离和辨析之后可能依然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确实可被用来描述国内多民族文化之间密切互动进程的某种趋向性。最重要的剥离，应该如一位日本民族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把“汉族化”和“汉化”区分开来，前者只用来指称涉及族属认同意识发生变化的情形，后者则只用来指称文化互动，特别是汉文化被大面积接受的情形。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汉化”的情形，固然在当前的中国各多民族地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但它们却未必导致“汉族化”的结果。就是说，一方面大量汲取汉文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却依然保持着他们独自的民族意识和认同。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少数民族在积极采借汉文化的同时，又以其民族文化和族际的文化互动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活动之中，从而使“中国文化”已不再只是汉族的文化，而是包含了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大量在族际文化互动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族际文化共享”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过剥离后的“汉化”概念，或许更适合被称为“华化”。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吸纳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并涵盖了众多的族际共享部分，所以，它才具有了一定的“普世性”。

不可否认，“汉化”依然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一直面临的现实境遇。伴随改革开放而推进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率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展开的，因此，和区域之间、民族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相关联，少数民族文化在相关的讨论中，同样也经常会被置于文化“现代化”的对立面。它们在和都市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以及汉族的文化相比较时，往往也难以避免被贴上“前现代”或“传统”的标签。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不无道理地强调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反对文化消费主义，赞赏自然和谐与绿色环保的“传统”文化要素，可当我们一旦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就会发现“现代化”的发展依然是当地人们最为基本和急切的诉求。

二、“全球化”带来了什么？

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而又不断地尝试和国际“接轨”的各种努力，到加盟WTO和成功申办奥运会等，“全球化”进程在中国，已是既有被动接受，又有主动追求的一个重大的社会事实。全球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很多变化和机遇，同时，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涉及文化、社会心理及人民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地带来了似乎要比“中国文化”更加具有“普世性”的和强势的“国际性”的文化。

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就已经开始面临类似的冲击和困扰了，但20世纪末期和即将展开的21世纪，问题却在新的背景下具备了更深刻的意义。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

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现实存在的混乱和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又导致忧虑无从释怀。对于一向具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来说，在全球化进程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如何为中国文化“定位”是最为根本的，即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中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使中国人能够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伦理和日常生活逻辑，持续性地主动参与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但在这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在内的认同，却又同时都是具有多重性结构的。

确实，我们需要有人不断地揭示，在全球化进程的“普世性”背后，其实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殊价值观。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这个进程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在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所引发的更为复杂的文化互动和“涵化”现象。

当前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些少数民族社会现在已经有可能直接和各种来源的国际文化影响相接触了，在学习、了解和接受“世界”文化时，已经有可能不再需要经过“汉化”或“华化”的过滤了。当然，其具体的情形和路径非常复杂，既有像延边朝鲜族接受韩国文化影响或云南傣族接受泰国文化影响那样的情形；也有像丽江纳西族那样，直接在“世界遗产”名义下，重新定义甚至重构纳西文化的情形；既有如云南迪庆的“香格里拉”再发现的演义那样，在国际或西方社会浪漫想象的边际进行自我定位的情形，也有中国的穆斯林世界一如既往地从西亚、中东地区汲取商业资源和宗教思想，其中不排除也有反西方及抵制全球化浪潮的倾向。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已经和正在不断地消灭着少数民族的“边地”属性。

当然，通过国家掌控的管道和以汉族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中介，少数民族社会逐渐被裹挟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分工秩序及文化关系格局的情形，则是眼下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基本趋势。在涉及这个过程的讨论中，既有经常借用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和有关“现代性”的叙说，以描述或分析汉族（其实部分地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少数民族之间文化关系，亦即采用“西方”概念体系简单地解释国内各族之间文化关系之复杂情形的论者；也有借用“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批评，致力于发现、寻求或赞赏少数民族文化之特有的“后现代”价值的论者。前者或被人批评为具有汉族中心主义的色彩，后者或被批评为站在“前现代”的场景下，却谈论着“后现代”的幻景。

从“全球化”的趋势，到“汉化”或“华化”的机制，再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存续状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或层级的结构。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这个过程或级序中，面临着一些独特的境遇和问题。

三、“文化自觉”的动向

敏锐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近年来曾多次提到“文化自觉”的命题。按他的解释，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的趋向。费孝通指出，有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就能加强对于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里，文化自觉是以理解所接触的多种异文化为基础，进而以认识本文化为前提的。在无法回避的全球化，

以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已有初步进展的基础上，努力寻求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乃是当前中国文化和知识界的主流性的呼声，而“文化自觉”则是这些呼声中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之一。尽管还有很多其他表述，观点也是各有歧义，但这些话语背后的动力机制却是一样的，而且话题的方向性也颇为接近。

但少数民族文化的情形又如何呢？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反复“华化”的结构性关系之中，却始终顽强地保持着各自的文化特性和民族认同。少数民族眼下又同时面临着全球化浪潮和国内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刺激和冲击，其文化动向很值得我们去认真关注。

在应对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压力时，少数民族的文化动向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趋向。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少数民族出身的精英分子或干部，直接借用“现代化”的文化理论，以谋求本族内部的文化和社会变革。这种倾向的基本特征是强烈意识到“落后”和“先进”或“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差距，并强烈地要求获得有更多现代化发展的机会，尤其在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要求获得平等的待遇。在这种倾向中，或者也会有关于“民族性”（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国民性”反思）的自我批评，有时还有直接就把“汉化”视为前途的意见。另外一种可以说是相反的倾向，则多少具有“后现代”色彩，即突出强调少数民族文化中“传统”、“自然”和“绿色”环保之类的因素，并认为它们具有超越“现代化”的价值。

就是说，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动向中，既有对现代化的呼唤，也有对“现代性”的批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因场景和氛围的不同，不少人常会在上述两种立场之间摇摆游移。这种情形，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独特处境和经常是两难的文化选择。在笔者看来，无论哪种立场或趋向，同样都是少数民族试图维系文化独特性和谋求“文化自觉”的体现。

若以旅游产业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为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少数民族的文化动向，通常会有如下一些反应：

①强化因自己的民族文化可被开发为旅游产业的资源而滋生的自豪感。夸张渲染本族文化历史和甚至是“绝对”价值的情形，时有所见。被世界和中心都市的观光客所欣赏，经常成为少数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具有“世界”性价值的论证依据。

②若将“观光客”群体定义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载体或体现者，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几乎所有旅游景区和景点，都会出现“迎合”亦即尽量满足客人文化消费主义的各种需求的现象。置身于具有“全球化”背景的旅游产业链之中，置身于“看”和“被看”的文化消费关系格局之中，同时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否乐意，无论主动或被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定位是在西方或中心都市的“边缘”、“末梢”，为得是满足其浪漫、好奇或“消闲”的消费。

③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人们通常会把文化分解为可公开展示的部分和不予展示的部分。这样，既可以方便地提供文化消费的产品，又可以较为容易地维系已有生活方式的基本稳定。不过，这种努力的结果，却有可能导致文化的断裂和认同的紊乱。

④在努力维系少数民族文化特性和民族认同的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为少数民族新的文化创造与发展提供了机遇。包括人们对文化作重新界定的情形，就较为常见。例如，把本

民族文化的某些部分，描述成是具有“现代”或“后现代”属性等等。

由此可见，在国内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冲击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向。分析这些动向，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显然是有很大帮助的。

截至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然面临着如何确立和提升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意识这一基本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自觉，将是中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应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个问题也就具有了更加复杂的含义。